

在變革中提升香港航運中心地位



顧敏康、趙勁松

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深化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深化改革作出實質性貢獻，這當中也包括自身要深化改革。《決定》指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決定》沒有如「十四五」規劃那樣提及香港「八大中心」定位，而是強調要提升三大中心，是有很強針對性的。

這既表明三大中心是香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表明這三個中心近年都面對嚴峻挑戰，因此需要在鞏固的基礎上進行提升。而提升，就必須堅持改革創新。本文圍繞香港航運中心，提出具體改革創新的路徑。

大約三千年前，古希臘依託航海技術的發展，創新了共同海損等法律制度，帶領人類從陸地貿易時代進入了海洋貿易時代。賣方的責任從其店舖向買方的方向延伸到了裝貨港，出現了今天被稱之為「離岸價格」（FOB）的貿易形式。古希臘正因為抓住了這第一次貿易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奠定了海商法和保險法，成就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其民族也享受了三千年的航運產業紅利。

配合發展趨勢完善法規

大約三百年前，英國依託電報技術的發展，完善了海運提單等法律制度，帶領人類從海洋貿易時代進入了單證貿易時代。賣方的責任從其店舖向買方的方向進一步延伸到了卸貨港，出現了「到岸價格」（CIF）貿易形式。英國正因為抓住了這第二次貿易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成

就了歷史上第二個國際航運中心，成為海洋大國。

今天，電腦技術催生的數字經濟時代，正在推動人類從單證貿易時代進入電商貿易時代，其法律特徵是賣方的責任進一步向買方的方向延伸到了買方的「門」，從而形成了「門到門」的貿易。香港必然也必須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積極思考建立新的法律規則，成就歷史上第三個國際航運中心，從而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事實上，國家「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都明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當中的關鍵詞是「提升」，就是在現有的碼頭和運輸業務之上，發展高增值的航運服務，關鍵是往價值鏈上行走，進行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買賣、租賃、登記、融資、海事保險以及相關海事法律服務等。

而充分發揮香港物流業的優勢，更可助力國家實現高水平開放，達至高質量發展，使國家的產品，能以更好的價格進入更廣泛的市場。梁振英先生在得出上述結論的同時進一步表示，香港海事金融方面的發展也非常有前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

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兩者結合可以為航運事業帶來更多幫助，要促成轉型需要行動。

梁先生呼籲大學研究調整現有課程整合，這主要就是指法律課程的創新和專業人才培養。從第一次貿易革命和第二次貿易革命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僅僅有科技發展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行法律制度創新，以應對和解決電商貿易時代未來「門到門」的貿易、「門到門」的結算和「門到門」的運輸所面臨的法律問題。另一方面，正因為第三次貿易革命迎來的是「門到門」的電商貿易時代，要實現「門到門」的運輸，就必須構建全球網絡，實現合同流、資金流、信息流、貨物流和單證流在全球暢通地「五流合一」。

由此看來，國家建設「一帶一路」的意義非常明顯，其關鍵可能不在於「贏利」，而在於「五通」。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區位優勢、金融貿易的高端服務優勢和普通法域的司法和國際仲裁優勢，具有創新電商貿易時代法律制度、完成上述全球「門到門」運輸體系建設歷史

任務的不二條件，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提供了歷史機遇、奠定了堅實基礎。

搭建海洋產權交易平台

鞏固和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必須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歷史使命和戰略定位。為此，需要創新法律制度，以解決未來國際航運面臨的重大發展問題；必須培養高端複合型人才，為成就國際航運中心準備人才。

此外，需要搭建航運大數據中心和航運電商單證交易平台，推動航運金融、海上保險和海事仲裁轉型升級。還需要搭建海洋產權交易平台，引領全球電商供應鏈發展；集聚全球海洋大數據，擁抱數字經濟時代；集聚全球海洋科技成果並開展評估和轉化，提升海洋高端服務能級，做大做強海事仲裁。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應當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和未來發展的角度，為全球國際航運未來發展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從而加快形成國際航運的新質生產力，為國家爭取海洋國際話語權、定價權和發展主導權。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

《香港基本法導讀》愛國主義教育的權威教材



議事論事
何建宗

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主編的《香港基本法導讀》（下稱《導讀》）於本月隆重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本書的撰稿人除了饒教授，還有（按筆畫序）清華大學的王振民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陳欣新教授、中山大學的陳廣漢教授、深圳大學的鄒平學教授，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的韓大元教授，稱之為當今港澳研究大咖的傾力之作，實不為過。更有意思的，是它既繼承又完善和發展了2009年出版的《香港基本法讀本》（下稱《讀本》），在香港踏入由治及興，愛國主義教育正在各領域大力推進的今天，本書的出版更是意義重大。

記得我十年前到北京大學修讀基本法博士的時候，前輩送給我一本當時已經絕版的《香港基本法讀本》複印本。這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編寫，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朱永誠老先生主編，顧問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許崇德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康希聖教授兩位基本法研究大師。從書架上找到並打開這本已經殘破不堪，布滿各種顏色的標註和筆記的《讀本》，再回看過去十多年香港的風風雨雨，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實在感慨萬千。

直奔「一國兩制」重點正本清源

回歸以來，香港絕大部分政治爭議都與基本法及其條文的解讀息息相關：諸如有關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第45條行政長官產生方式，以及第104條對官員就職宣誓的規定等議題，一直爭議不斷，撕裂香港社會。這種現象突顯出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的認識普遍不足和片面，也反映出深入認識基本法對於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的重要性。

誠如編者所言，基本法內涵宏大，涉及面廣，一本能為普羅大眾提供解讀準確，通俗易懂的基本法讀本，至關重要。本書參考了《讀本》的體例，按照基本法條款的順序加以闡釋，當中包含基本法多年來實踐相關的議題和爭議，起到釋疑解惑的重要作用。比如有關「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一章，作者沒有採取逐項條文解釋的傳統做法，而是「直奔重點」：從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開始說起，帶出特區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來源、基本法作為授權法和下位法的性質；再詳細列出中央和中央授予特區의每項權力。本章和其他章節一樣，六位作者憑着數十年參與港澳研究工作的經驗和閱歷、對香港特區的深入了解和對香港同胞的真摯感情，字字珠璣，言簡意賅；讀後讓人豁然開朗，起到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輿論戰場上的「國家級」利器

事實上，西方個別媒體和政客，經常惡意攻擊中央政府「損害『一國兩制』」，英國廣播公司（BBC）最近更妄言「香港被抹去」。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從1980年代開始，中央始終支持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並循序漸進發展民主，而當中的關鍵是，正確認識「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從鄧小平開始，每一代的領導人，每一代的中央官員和基本法學者，都是堅守「一國兩制」，他們的論述一脈相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而「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隨着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的深入推進，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得到越來越多廣大香港市民認同。個別西方媒體和政客與竄逃海外的亂港分子勾結，肆意歪曲和唱衰中央和香港，我們必須持續的在輿論

戰場上作出詮釋權和話語權的鬥爭，而《導讀》的面世，無疑是「國家級」的重要利器！

與《香港基本法讀本》比較，《香港基本法導讀》無疑是承先啟後，更上一層樓。首先，當年的《讀本》是在內地出版，是「針對內地各級幹部的學習和工作需要」，最新的《導讀》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更主動的面向香港社會各界，並及時增添包括香港國安法和今年3月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要內容，滿足了香港各界的基本法教育的需要。長期參與港澳工作的饒戈平、王振民和韓大元三位《讀本》的原作者同時編寫《導讀》，更是繼往開來的最佳印證。

《導讀》的重點在於「導」，在於正確解釋和引導香港市民認識「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制度，在於開導部分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所誤解和疑惑的內地、港澳同胞和海外友人，也在於協助廣大內地和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者，教導和培養下一代愛國愛港青年，諄諄善誘，久久為功，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



◀《讀本》為當今港澳研究「大咖」的傾力之作。

加快破解產業深度轉型難題



議論風生
陳成爐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

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揭示了新質生產力的基本特徵，明確了國家在新時代對發展生產力的新的重大要求。這也與「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高科技中心不謀而合。

積極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香港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的使命任務，更是推動創新高科技成為香港發展新引擎的必然選擇。

香港具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多方面優勢與機遇。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發展，帶動了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為特徵的重大產業和技術革命。新質生產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基礎研究重大突破及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成果應用基礎上產生的。

香港擁有多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學，有優秀的科技人才，同時還有基礎科研實力雄厚、與大灣區其他城市聯繫緊密等多重優勢。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在加速推動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中，已吸引了不少國內外知名企業來港發展。香港在人工智慧領域擁有基礎科研優勢和豐富的數據資源，正在建設人工智慧超算中心……這些優勢都為香港加快發展具有本地優勢的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香港進一步培育新質生產力需要補齊短板和突破瓶頸。產業是生產力的載體，產業轉型升級是生產力變革的表現形式。人類每一次重大科技革新都會深刻改變產業形態和生產組織方式，帶來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迭代升級。新質生產力同樣會帶來產業結構、企業形態、產品品質發生重大變革。

當前，香港產業結構存在發展不均衡

的問題，其中與創科發展息息相關的製造業僅佔GDP的1%，遠低於全球其他先進經濟體。這是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和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必須解決的挑戰和問題。

特區政府於去年底公布的《香港創新高科技發展藍圖》指出，香港創科發展方面存在吸引和挽留人才的力量不足、科研成果轉化動力不足、土地供應緊張且開拓用地需時較長等制約因素。香港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如何強化大學基礎科研活動及設施的支援、加強激勵成果轉化落地的力度、增加創科土地及提升基建配套、加強資助年輕科研學習等多個方面着力落實，是香港抓住發展新質生產力進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必須破解的難題。

因地制宜打好香港「特色牌」

香港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要因地制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香港要找準自身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定位，充分發揮發展潛能和比較優勢，打好「特色牌」。

推進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產業鏈的結合和優勢互補，是香港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路徑和獨特優勢。去年3月，特區政府與國家科技部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高科技中心的安排》，標誌着兩地科技合作開啟新篇章。近年來，隨着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大灣區各城市的科研交流與創科合作越發緊密。以深港合作為例，香港擁有扎實的科研能力，深圳具備完善的產業鏈條，深港創科優勢互補，可以高效整合全國乃至全球的創科資源，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得天獨厚的優勢。

發揮自身獨特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方能更好賦能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這既是鞏固提升香港地位的重要路徑，也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使命任務。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

哈里斯擊敗特朗普的機會有多大？



知微篇
周八駿

哈里斯取代拜登出任美國民主黨參與2024年11月第六十屆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使美國民主黨高層維持了團結。但是，奪取選舉勝利，只能靠哈里斯及其最大支持者拜登和競選團隊的努力。

拜登2024年7月24日在就其退選向全美國發表電視演講中稱，為了美國民主他把火炬交給了下一代。這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國社會注意力引向特朗普的年齡上。但僅對一些中間選民有一定影響，而且是暫時的。共和民主兩黨的支持者早已形成對抗的兩大陣營。何況，特朗普的年齡不是秘密。特朗普瘋狂，但精力充沛。

哈里斯個人至少有三點不足：一、哈里斯無法提出同拜登不一樣的

競選政綱。

作為第一位競選總統的非裔和南亞裔女性，哈里斯確實能夠吸引一部分選民，但不足以吸引能決定選舉結果的相當多數中間選民。

美國兩黨陣營不在乎總統候選人的政綱，但是，中間選民重視。哈里斯以副手身份代拜登出征，不可能在拜登已公開的政策主張上增添足以吸引中間選民的新內容。

不久前，美俄大規模換囚，華府特地張揚哈里斯的特殊貢獻。然而，這一類效果不可能持續至11月投票日。

對哈里斯不利的是，美國最新經濟數據顯示經濟可能衰退。即使未必發生，但美國社會尤其金融市場已然出現的反應，對哈里斯作為現任副總統是不利的。

二、哈里斯曾是檢察官和州總檢察長的履歷，不足以形成她是美國法治捍衛者與特朗普是罪犯之間的差異。

因為，特朗普早已涉及多起刑事案，不是突然被揭發有犯罪的嫌疑。從2016年大選起，美國現實政治已經與政治道德和法治相分離，2024年大選的情形更惡劣。

三、哈里斯難以給美國和美國人民帶來新希望。

這染特朗普當選會帶給美國民主以毀滅性打擊，是強調美國面臨災難。打敗特朗普，哈里斯必須有能力描繪美國正走向美好，而引領美國和美國人民實現美好前景的，唯有哈里斯和民主黨。但是拜登做不到這一點，哈里斯也做不到。

哈里斯經常在公眾場合演說時傻笑，給人的印象是欠老練穩重。這不符合當前和今後4年美國需要一位穩重而進取的領袖。哈里斯的競選團隊似乎明白這一點，提出一個口號——「讓美國再次歡笑！」。

坦率講，提出這樣的口號很愚蠢。與其說對哈里斯的選情有幫助，不如說引導

美國選民反思為什麼在拜登—哈里斯政府領導下，美國人民無法歡笑？

與此同時，哈里斯面對愈益不利的外部環境。

2020年，拜登競選美國第五十九屆總統時提出口號——「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他在美國《外交》雙月刊2020年3月／4月號發表《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該文的副標題是——拯救後特朗普的美國外交政策。拜登稱：「自從奧巴馬總統和我於2017年1月20日卸任以來，幾乎從任何角度看，美國在世界上的信譽和影響力均有所下降。」拜登歸咎於「特朗普總統貶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拋棄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攻擊了我們自己的情報人員、外交官和軍隊，給我們的對手壯膽，浪費了我們應對國家安全挑戰的籌碼，從朝鮮到伊朗，從敘利亞到阿富汗再到委內瑞拉，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果。」

然而，在拜登—哈里斯政府執政3年半

後，2024年4月29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博爾格、布倫德對話時承認，拜登總統所謂「後冷戰時代」結束、進入「歷史的轉折點」，是意味着美國的霸權地位衰落。

儘管拜登—哈里斯政府反覆強調，中國是唯一既有意願也有能力挑戰美國的對手，千方百計打壓圍堵遏制中國。但是，4月29日，布林肯同布倫德對話時感嘆——「美中關係令人難以置信地複雜」。不啻承認拜登—哈里斯政府對華方針和政策失效。

美國在拜登—哈里斯政府領導下，不僅未能再次領導世界，甚至全球地位進一步下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美國返以色列，即讓其手下暗殺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最親密的盟友自行其是，令拜登—哈里斯政府難堪。

資深評論員、博士